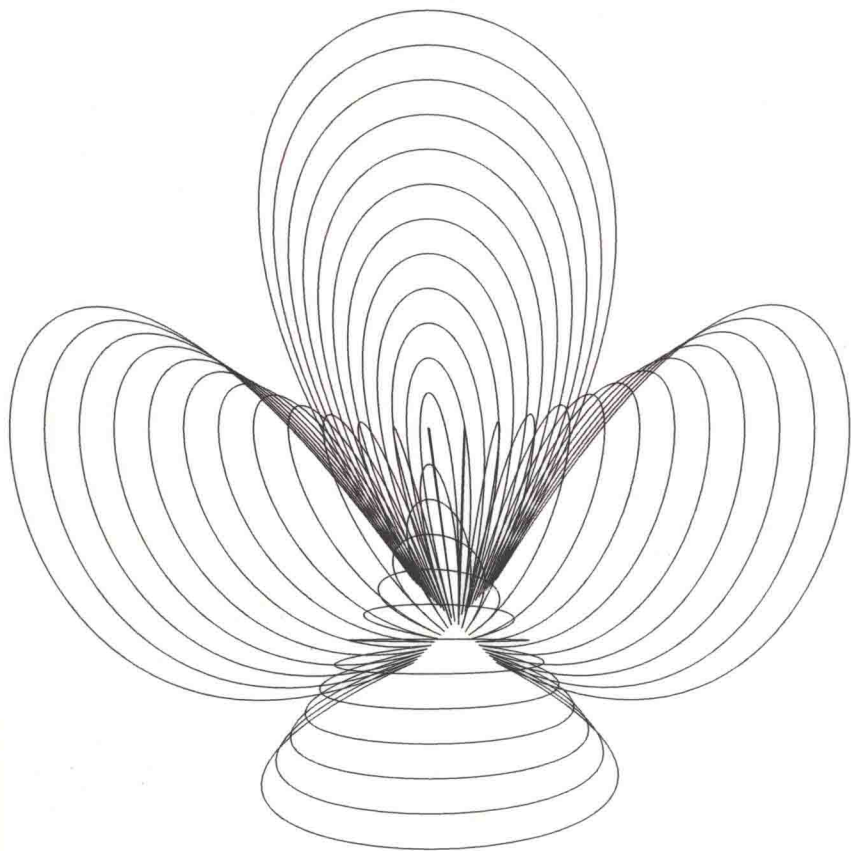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编辑出版史 研究

刘剑涛——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BIANJI CHUBANSHI YANJIU

编辑出版史研究

刘剑涛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出版史研究/刘剑涛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4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9-1474-5

I. ①编… II. ①刘… III. ①编辑工作—文化史—中国—文集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G23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7655 号

责任编辑 田丽贞 郑 鑫

责任校对 田利鹏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101 号 邮编:45001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赵国祥	宋应离	王振铎	张如法
主 任	刘志军	乔家君	程遂营	
副主任	蔡 军	张举奎	姬建敏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华生	王鹏飞	史洪智	李建伟
	刘剑涛	姬建敏	韩顺友	焦薇缜

寻找历史的智慧

——《编辑出版史研究》前言

我国编辑出版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文献的编辑出版、典藏聚散都是该时期文化发展的标志。其间虽不乏焚书坑儒、战祸兵燹等坎坷,但终不掩其耀眼光芒,孔子、刘知几、朱熹、冯梦龙、严可均、邹韬奋、茅盾等编纂大师灿若星河,《诗》《书》《礼》《易》《乐》《春秋》《尔雅》《史通》《文选》《四库全书》等皇皇巨著浩如烟海。与我国编辑出版深厚的历史相比较,我们对它的研究尤其显不足,它的起源、演进,它的冲突、交融,它的特色、规律,它的骄人业绩等都有待于我们深入发掘和探讨。

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编辑出版史方面的专著,如,张召奎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概要》,姚福申先生主编的《中国编辑史》,肖东发、方厚枢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等,其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论述理据充分,深入浅出,对我国的编辑出版史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凝聚了编者的心血;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也出版过几本编辑出版方面的论文集,它基本是近年来每年论文的精华集锦,其中也有一些编辑出版史方面的文章。这些论著,虽各有所长,但亦有不足之处,如,有的专著因主要针对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挖掘,有的论文集涵括的研究时间较短,难以做整体上的把握等。

创刊于1934年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今年她迎来了创刊80周年华诞。回顾其80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惊喜地发现,其“编辑学研究”栏目在几代编辑的辛勤耕耘下,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获得了新生,各编辑出版单位亟需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1983年,胡乔木致信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试办编辑学专业。当时,《河南大学学报》敏锐地触摸到这一时代的脉搏,顺应时代的要求,1985年初,在全

国率先开辟“学报编辑工作论坛”栏目(1988年第1期,该栏目改为“编辑学研究”),正如我国著名编辑学研究者张如法先生在《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专栏述评》一文中所言,从此“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学报或其他学术刊物上,才有了编辑学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发表园地”。迄今,该栏目先后发表了边春光、林穗芳、方汉奇、刘杲、邵益文、杨焕章、潘国琪、龙协涛、苏双碧、郑成思、刘光裕、王华良、赵航、田胜立、张积玉、王振铎、宋应离、李频、尹玉吉等知名编辑学研究专家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论文400余篇,内容主要包括:编辑出版工作的起源及发展、著名典籍体例的演变、编辑家的业绩、编辑思想、编辑活动、编辑成就及知名书刊的发展、沿革等诸多方面,这些文章不断开疆拓土,不少都与重大社会现实课题相关,既具有学术前沿性和社会现实性,又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领编辑出版研究之新风。本书从中遴选与编辑出版史相关的文章22篇,以管窥《河南大学学报》在我国编辑出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以往的专著相比,其发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栏目为国内第一家设立该领域研究栏目的优势,选文更注重文章的视野及深度,在个案的研究上注重深耕,并汇集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的论文集相比,其所选文章时间跨度更长:1985—2013年,涉及新时期以来各阶段的研究,选题范围更广、更全面,知名专家学者更多、影响更大。

本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以编辑家与编辑出版史为视角,选取了《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祖师——兼议我国编辑工作的起源》《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朱熹:因中原文献之传而编辑宋儒理学之大成——兼论朱熹与吕祖谦的编辑架构思想》等9篇文章;第二编以书刊与编辑出版史为视角,选取了《〈尔雅〉的编纂旨趣、分类思想与训释逻辑》《选学:中国编辑学史的一大类别》《罗伯托·布萨和世界最早用计算机辅助编辑的巨著〈托马斯著作索引〉》等8篇文章;第三编以政治、经济、文化与编辑出版史为视角,选取了《持之以恒 必有所获——论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文化遗产与智民之梦——20世纪前半期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的社会责任观》等5篇文章。

各编在选文的过程中,以文章所涉我国历史发展的时间为序,因书籍印张所限,为兼顾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及各编篇数的基本均衡,一些优秀的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如,胡益祥先生的《孔子编纂学探微——中国编辑史研究之一》(1989年第1期)、阎现章先生的《明代〈救荒本草〉编辑特色试探》(1993年第4期)、金薇薇先生的《从〈皇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论陈子龙的编辑思想》(2000年第6期)、汪维真先生的《期刊史是视野下的〈新史学通讯〉》(2008年第4期)、韩爱萍先生的《〈河南〉杂志与鲁迅——兼论〈河南〉

杂志的时代意义及其影响》(2013年第6期)等。

在再次编辑我刊曾经刊出的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如此真切地面对我们上下五千年古老的文化,为每位作者在历史的沟壑中超然远览、筚路蓝缕、爬梳剔抉、参互考寻而感动,同时,我也清晰地看到30年来我国编辑出版研究一路走来的艰难及其不断科学化、规范化的进程。为了尊重学科发展的历史,每篇文章除核校以往校对的硬伤外,基本保持了文章最初发表时的模样,所以,书中所有文章的体例并不一致。如,有的文章作者只有姓名,没有其他介绍,有其他介绍的,性别、籍贯、所在单位、职称、学位、研究方向等各项的介绍也不尽齐全;再如,参考文献著录项目、著录顺序、著录用的符号、各个著录项目的著录方法以及参考文献标注法也不一致。沿着这些杂乱的体例,我们不难寻绎出其演进的步履,从上世纪80年代相关要求不严,到90年代的逐步探索,再到本世纪的科学规范。

当然,现在再回眸二三十年以前的文章,其间所受时代的局限也清晰可见。未入选的文章也有研究方法老套、论述疏浅之作。到目前为止,编辑出版研究方面的文章,从编辑家、书刊个案研究着手的较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出发进行综合性研究者相对较少。编辑出版理论的研究尤待加强。内容上,一些文章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刊载于1990年第6期的文章在论及晚清教科书的编辑时这样评价西方传教士的编辑目的:“当然,传教士不是为了让中国富强,是为了夺中国人之心,为其培养一批忠实的奴才。”这显然有失偏颇。再如,2001年第1期有文章论编辑出版史的研究方法时说:“胡适在现代学术史上应该如何评价是可以讨论的,但他是新政协通报的战犯,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说他是‘圣人’,是不大了解历史。”以今天的眼光看,关于胡适的研究已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阈。但是,瑕不掩瑜,这些文章依然为我们的编辑出版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走进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探寻本质的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进入我们的生活,社会对编辑出版工作及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相信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历史会给今天的我们以智慧的启迪,在她的引领下,我们的脚步会更坚实,我们的道路会更宽广。让历史烛照我们的未来!

刘剑涛

目 录

第一编 编辑家与编辑出版史

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祖师

——兼议我国编辑工作的起源…………… 李光宇(3)

刘知几的编辑观

——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 胡益祥(11)

朱熹:因中原文献之传而编辑宋儒理学之大成

——兼论朱熹与吕祖谦的编辑架构思想……………

…………… 王振铎 甄 娜(23)

编纂高手 评论大师

——从《古今谭概》看冯梦龙的编辑成就…………… 徐振辉(33)

学海之大观 艺林之宝籍

——严可均编辑思想与成就论…………… 阎现章 杨规划(40)

广学会传教士的报刊编辑观…………… 李明山(49)

毛泽东的报刊编辑思想初探…………… 吴昌林(59)

略论矛盾的编辑思想和实践…………… 徐 枫(65)

文学大师的编辑情怀…………… 李自强(77)

第二编 书刊与编辑出版史

《尔雅》的编纂旨趣、分类思想与训释逻辑…………… 钱荣贵(87)

选学:中国编辑学史的一大类别…………… 俞润生(95)

晚清教科书编辑述论…………… 里 明(106)

从类书的沿革看我国编辑史的发展…………… 段金泖(113)

论古籍编撰活动中的编辑思想…………… 吴 平(118)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类期刊研究…………… 张志强 肖 超(133)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河南期刊

- 兼述对新时期河南期刊界的启示…………… 宋应离(143)
- 罗伯托·布萨和世界最早用计算机辅助编辑的巨著
《托马斯著作索引》…………… 林穗芳(154)

第三编 政治、经济、文化与编辑出版史

持之以恒 必有所获

- 论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 邵益文(171)
- 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
——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于翠玲(176)
- 文化传承与智民之梦
——20世纪前半期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的社会责任观
…………… 潘文年(184)
- 编辑出版学研究的不同视角…………… 郭玲 王会(193)
- 论编辑思想形成的外部作用…………… 吴平(201)

第一编 编辑家与编辑出版史

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祖师

——兼议我国编辑工作的起源

一、我国编辑工作始于孔子

我国编辑工作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的说,自有文字材料以后就有编辑,殷代的甲骨文字,便是早期编辑活动的产物,而当时从事占卜和管理甲骨文的“卜人”,便是最早的编辑工作者。有的说,殷代已有了“典册”,当时的史官将文字材料“编次成册”,做的就是编辑工作,史官便是不知名的编辑家(以上二说,实为一说,都认为我国编辑工作在殷代已经开始)。还有的说,古代的编辑工作是从校勘文献开始的。西周末年正考父校《商颂》,是见诸文献的最早的校勘记载,故正考父当为我国编辑的始祖。我认为,我国古代的编辑工作是从编辑书籍开始的,书籍是编辑工作的直接产物。因此,我国最早的编辑工作当始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因为他编辑的“六经”,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书籍。史称孔子作《春秋》,故孔子为史学之祖;而孔子编“六经”,故孔子理应为编辑之祖。我国编辑史当从孔子讲起。

有些同志也承认孔子是我国编辑工作者的第一祖,但又认为早在孔子以前,编辑工作已经出现,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殷代起源说。殷代是否开始了编辑,则要看殷代是否产生了书籍。

书籍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的书籍最早的形式是简策(一作“册”)。在殷代,确已有“典册”的记载,如《尚出·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出土的甲骨文也发现过许多册的象形字,如、等。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殷代已经有了简册书籍。但是,殷代的“典册”,究竟是把几片甲骨连在一起,还是用竹木片做的简册,现在还难以断定。迄今出土的简册,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而大量的是秦简和汉简。因此,在尚未发现殷代的简册之前,我们还不能把推测的可能性当做已有的事实来论证。也有些学者,虽然认为殷代的“典册”还不是编简而成的简册,而是用甲

骨串联起来的“龟册”，但又认为这些甲骨片既已编次成册，那也便是编辑工作了。的确，现在我们还只能把殷代的“典册”当做“龟册”来看待，但那种在甲骨片上钻孔、用绳子串联的所谓“编次成册”，只能算作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不能算作编辑工作。因为殷代卜人、史官记录在甲骨片上的卜辞以及其后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都是历史上书契（即文字）实物，属于文献资料范围。就是经过串联的甲骨文“典册”，也只是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而已，并不能算是正式书籍。就像现在学者做的文字卡片一样，为了妥善保存和便于使用，将它分档编次，我们也并未当做就是书籍，它只能是卡片资料。而且，作为书籍，应是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知识的工具。而殷代的甲骨文“典册”，只是为了保存历史档案，以便“父子相传，以持王公”（《礼记·檀弓》），让他们的王公子孙缅怀先王的业绩，沿袭祖先的统治方法，以延续其种族统治。故殷时的“典册”档案只是藏之官府、专供少数贵族统治者及其子孙内部使用的，故还不具备书籍的性质。再说，编辑工作也应有特定的含义，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编辑工作是对原有的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而古代最初的资料 and 作品就是殷代以及后来周代的文献资料，因此，古代最初的编辑工作便是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以此而论，殷代的“典册”，只是卜人、史官编串保存，一代代继续下去，对文献资料本身并未作任何加工，他们也不能加工，只是“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礼记·檀弓》）。如此怎能算是编辑工作！因此，可以说，殷代既未有正式书籍出现，那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编辑工作。退一步说，即使殷代的“典册”断定它就是简册，但也不能笼统地把简册都当成书籍。固然书籍的最初形式是简册，但如果它不仅作为历史档案编次保存，那它们属于文献资料范围，还不是书籍的独立的形态，只有作为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知识的简册，才能算作真正的书籍，而这样的简册书籍必然要经过编辑者有目的的整理、加工后才能产生。孔子整理编辑的“六经”，就是这样的简册书籍。

至于正考父校书事例，文献上确有这样的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西周末年为宋国大夫。宋是殷旧贵族微子的封地，保存着殷商时期的乐章乐谱。正考父搜集到《商颂》十二篇，“恐其舛缪，故就太师校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经过周太师的指教，才编定以《那》篇为首篇的次序。此事文献虽有这样的记载，但历来对此有所争议，有人考证，在那时乐谱已皆散亡，依据既无，何以校订。故此事尚待考实，不能作为定论。而且记载也缺乏细节，究竟正考父是怎样校正舛缪的，怎样编定篇次的，详情不得而知。因此，我们还不能凭这句话焉不详的记载就把正考父看做我国编辑的始祖。而他的后裔孔丘，整理编辑“六经”，确实是有根有据的，《论语》《史记》和《汉

书·艺文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还散见于汉以后的有关著作中。古今文学家虽所见不同,但都肯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古文学家说孔子对三代旧典做过搜集、整理和补充,今文学家甚至说“六经”为孔子之创作。虽然有人提出疑义,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总因缺乏过硬的材料或推论欠当而经不起辩驳,也就无法确证《史记》等记载为妄说。

二、孔子整理编辑古文献的内外动因

孔子编“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文献进行总结账式的大整理。其工程之浩大,工作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足够的主观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社会的变革现实,要求人们对过去的礼、乐典章(传统的文化思想)重新加以认识,并建立新的文化思想体系,以便为社会现实服务,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不会不面对现实。正是在社会变革现实的触发下,他才感到有重新制定礼乐的必要。而且他在“究观古今之篇籍”(《汉书·儒林传》)之后,得出了历史是前后相继而发展的结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传统文化是可以改革的,也是应该改革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他在整理编辑古文献中对周礼作了认真的损益(批判继承),并加以新的解释,最明显的是,给周礼增添了新的内容,“仁”^[1]。孔子的仁反映了他的历史发展观,具有时代改革的精神。“仁者爱人”,就反映了奴隶们要求从会说话的工具转变为具有社会人格的人这个现实。郭沫若也说过,孔子的仁“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对人的发现”^[2]。孔子的这种以仁阐发礼的思想(包括正名、重民等思想),可以说是他编辑“六经”的指导思想。可见,“六经”是孔子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而编辑的。另外,由于社会的变革,阶级开始分化,出现了新的“士”——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士纷纷要求参加政治活动,而当时各国诸侯大夫和新兴的地主势力为了增强自己在争战中的力量,也都企望招来有才能的士作为助手,于是,士的地位提高了。不仅贵族子弟,广大“庶人”也要求获得文化知识以跻身于士,于是,教育士的大师也就应运而生。孔子就是首创“私学”、最早的教育士的大师之一。教育士自然需要教材,“六经”正是适应这种社会需要,作为教育士的课本而编辑的。

从孔子的主观方面来看,他对古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有着自己的内在动力——兴趣与决心,并具备了编辑的力量和条件。孔子少年时就好学不倦,阅读了不少三代文化典册;壮年时他问官于郯子,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莒弘,

学琴于师襄(《孔子家语》);到了晚年,更喜欢读《易》。他不仅致力于礼乐典章的研究,而且对“天时”、“水土”也有极浓厚的兴趣,这使他终于成为“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输》)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博学多艺为他整理编辑“六经”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孔子是很关心政治的人,很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是他一生中仕途不利。政治上的不得志,更促使他专心从事教育与编书,一方面希望通过教育,让他的弟子去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编书,向当权者宣传他的儒家思想。这就是他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他编的书能发生政治影响,就等于自己去参政了。故他把办教育和整理编辑古文献都当做政治工作来看待。正是这种施教与编书的动机,促使他决心要在这两方面做出成绩来(事实上孔子的一生主要做了这两件事)。在编辑力量上,除了孔子本人外,他还有弟子三千,尤其是其中精通六艺者 72 人,是他整理编辑“六经”的得力助手。史载,孔子为了编《春秋》,就使子夏等 14 人去求周史记,得到 120 国的“宝书”(《公羊传疏》)。而且孔子是很尊重别人的意见的,司马迁说他“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史记·孔子世家》)。他与他的学生几十年朝夕相处,对学生也很尊重,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在《论语》中,记述孔子和学生讨论“仁”的地方就有很多。可见,从搜集资料到编定内容都有他的学生参加。恐怕只有《春秋》一书,孔子编定以后再也不准学生改动(《史记·孔子世家》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外,其他的很可能在编定以后,学生仍是可以讨论研究、提意见作改动的,直到大家满意后定稿。甚至可能有些篇目、内容就是他的学生起草编写的,当然“主编”是孔子。至于一些繁重的具体编务工作(如竹简的截切、烘干、缮写、编联等),更不会是孔子一个人做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劳作的。

此外,在孔子的时代,社会上典册文献已相当繁多,这也为孔子收集材料、编辑“六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记载,早在殷政权将要垮台的时候,就有“商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奔周”(《吕氏春秋·先识》)。图法就是典册文献,这位逃奔周人的商史官向挚,携带的典册要用车载,可见其数量之多。及至周室东迁,典册文献流散就更多了,有些还遭到了毁坏。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动,阶级的分化,一部分旧史官由贵族而下降,有的加入了“士”的阶层,有些原来藏于官府的典册文献,也随之散落到民间。史称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墨子·贵义》)。出身平民的手工艺者墨翟,已搜集到很多的书(典册文献),说明春秋末期社会上的文献资料已流传得很广泛了。并且,这时候政府的文献档案也在一定范围内向外开放,人们可以去借阅和利用了。上述子夏等 14 人就是在周室借到的“宝书”。韩宣子从鲁国太史那

里也阅读了许多记录周礼的文献(《左传·昭公二年》)。而孔子生活的鲁国,是保存文献档案最多的诸侯国,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使孔子有可能在原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新典籍,构建新学派。

三、孔子编辑“六经”的首创精神

社会上流传的文献是繁多的,但又是很散乱的。这给孔子的整理编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并且又前无先例,无古法可遵循,一切要自己开创。“六经”的编定,体现了孔子筚路蓝缕的首创精神。

《春秋》是孔子搜集和研究了“百二十国宝书”及散落在社会上的一部分文献资料编撰而成的。它虽以鲁国纪年,但也兼及各国史实;它以记载征伐、会盟、朝聘等政治活动为主,但也记有天文、地理、祭祀、婚丧、城筑、土田等情况。这些内容十分广泛的史料,是从大量的“史记”中筛选出来的,作为“主编”的孔子,不知做了多少“芟夷烦乱”的工作。而且它所记载的政治活动和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都很准确。在编辑体例上,他吸收了鲁春秋的旧义例,又自创了新的“凡例”,即首创了完整严谨的编年体例。它按年、月、日、时,记远近,别异同(杜预《左传序》),使历史事实系统化,给读者以鲜明的时间观念,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后联系和相互关系,开创了编年史的先河。章学诚说:“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校雠通义·宗刘编》)在公元前5世纪,孔子就创立了这种编年史题材,既是我国史学的光荣,也是我国编辑学的光荣。而且它的“标题立义,一如今日的报纸标题和大事年表,那在世界史学上也是首创的”^[3]。同样,记载上古之事的《尚书》,也是孔子搜集整理了夏、商、周三代统治者的讲演、命令、宣誓等记录及其他有关文献而编成的。当时这类典册也相当繁多,一说孔子收集到三千多篇,经他“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孔安国:《尚书序》)的选编,删去了繁琐的和荒诞的部分,并按事情的先后,汇编成100篇,使得原来内容十分杂芜、次序十分凌乱的古之史“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孔安国:《尚书序》)。更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已经用“序”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编书的目的意义,他在编定《尚书》后,还在各篇篇首写了“序”言。班固说:“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不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为书作序,这也是首创的。自古以来,凡出书必写序言之传统,概出乎孔子。《诗经》三百篇的编辑过程也是十分艰巨的。孔子几乎采集了当时流行的全部诗歌,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的。古诗本来非常杂,孔子根据诗的内容和形式分为风、雅、

颂和赋、比、兴六类，即所谓“诗的六义”。这也是中国诗歌分类编辑体义的滥觞，它成为历代诗人批评的一定准则。孔子谙熟音乐，对诗三百篇还做了认真的“乐正”工作，也就是校订乐调，并“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务求诗歌合乎风、雅、颂之乐调。由此可知，《乐》是审订诗歌的乐谱，与《诗》的整理编辑是结合进行的。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这种配上音乐又歌又舞的诵诗编乐的方式，也是孔子的一种创造。对于乐，孔子非常重视它与礼的关系和它的社会作用。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认为乐音不仅可以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而且可以使人懂得礼节，移风易俗。所以，对《乐》的编辑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是花了很大心血的。可惜，遭秦火以后，由于乐不是文字的东西，后世已经失传。但对古乐进行系统的整理并与诗、歌、舞结合起来研究，最早的开创者是孔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至于《礼》的编辑，孔子贯彻了他的“损益”的发展观，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仪作了认真的增删。这种从现实出发，对原材料进行有目的、有选择的编辑，也为后人作出了榜样，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在《礼记·礼运》篇中阐发的“小康大同”的儒家政治蓝图，竟然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已经产生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祖国的历史珍品。《易》是孔子晚年时编辑的。司马迁记，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曾“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可见，《易经》是经过孔子仔细琢磨、反复研究之后而编成的。编修后的《易经》，使“主要与‘鬼谋’（向鬼神问吉凶）的《易》，改变为主要与‘人谋’（人自造吉凶）的《易》”^[4]，这充分反映了孔子思想的进步性和编辑工作的创造性。

在“六经”的整个编辑过程中，孔子根据编辑的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取舍材料，以内容和形式厘定书籍的体裁和编辑的方式，这都体现了他的创造性。就是他那种勤于搜寻、勤于考查、重证据不乱编的严肃认真的编辑态度，也为后人的编著作出了榜样。

然而，历来有人提出，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只是对古文献作了一番整理而已，谈不上什么创造。这就涉及孔子的编辑理论问题了。对此，似有必要做一点分析。

四、孔子的编辑理论

理论来之于实践。“述而不作”论是孔子在编辑“六经”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编辑理论（亦可说是编辑原则）。所谓“述而不作”，即尊重史实，保持原来的文辞，不无根据地想象乱编。《论语·子罕》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可随意臆测，不作武断结论，不要固执成见，不单凭个人主见。这可以看做是“述而不作”论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孔子严谨的治学精